

论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

华东师范大学 崔运武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他的“商战论”、“议院论”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他整个维新改良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教育启蒙思想,却鲜有论及。实际上,他较早地积极倡导学“西学”,并提出“西学”内容;他对科举制弊端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积极提倡女子教育;最为突出的是他最早将“自救”纳入学校范围,积极倡导近代学制。他对中国近代学制的设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能由弱转强,在强敌环伺下继续生存,这是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重大问题。郑观应就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1873年,他出版了《救时揭要》,对列强的侵略予以深刻揭露。此后,他“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盛世危言·自序》)。刊于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1982年版)积十年之思,于1880年在《易言》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维新方案。

他认为要去除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必须实行公法,而公法只有国家强盛才存在。而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近代工商业。在《易言·论机器》中,他明确提出广用机器是“致富之要道”。机器从何而来?他认为一是购买;二是自造。自造乃保证中国赶上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关键。为此,就必须有自己精通新技术的人才,把培养新的人才作为他改革方案的一个基点。他认为,要掌握新的科学技术,只有学习“西学”。他列了举诸如天球、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言语、政事、律例等“西学”科目,并归为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类。这与时人所提及的语言、格致、天文、地理、数学等“西学”内容相比,明显地丰富了许多。他认为求富强最迫切需要的是掌握“西学”的人才。那么如何培养这种人才呢?郑观应考查了在培养人上起着指导作用的科举制度,他认为这与客观需要有极大的差距。郑观应指出:“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豪杰每有沈沦。”(《易言·论考试》,刊于《郑观应集》,上册)但是,郑观应认为科举考试制度可改不可废,从一开始他就是在科举制度存在的背景下探讨人才的培养,进而设想学校制度的。他认为改革科举的具体方法是在文试中考经史、策论、诗赋,废除帖括;在武试中加考军事地理、算学、格致、机器制造。

对科举制弊端进行揭露与批判,并非郑观应提倡,在他之前的魏源、冯桂芳,与他同时代的薛福成、王韬等均从不同的侧面对科举弊端予以针砭;由求富强而注重人才,也非郑观应独有,王韬就曾认为:“今日我国之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才。”(《毁国尺牍·代上丁中丞》,刊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版,1983年)郑观应的独到之处,在于将人才培养纳入学校范围,即放入上下相衔的两级学堂之中。郑观应提出了设立新的,以教授“西学”为主的学校——京都大学院和省设书院。要求在各省会都设书院,选十余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人入学。他要求学生入学后,先通中西文学,然后根据各人的性情,选特定的科目,“肄业四年,升至京都大学院。”(《易言·论考试》)在京都大学院学习四至五年,学成后派往总理衙门及海疆督抚等处任职。这样,他提出了一个教授西学,有一定学习年限,上下两级学校相衔的学校系统。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近代学制的特征。

郑观应是根据西方的学制而提出上述设想的。他说西方各国的学制，德国最完备，“其学堂自乡而城、而郡、而都，各有层次。”他介绍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校系统以及与大学并列的各种专门学院的学校系统。他说德国“男女无论贵贱，自七、八岁起皆入学，至十五岁为小成。”大学在十八岁以上才能入学，而且“塾中分十余班，考其勤惰以为升降，其沈沦未班者不得出院学艺，”实学院也分十三班，考工计程以定进止。”（《易言·论洋学》，刊于《郑观应集》，上册）描绘了班级制的基本特征。这样，他从各级学校的性质、任务、学习年限、衔接等方面，向人们勾勒出一幅相当完整的西方近代学制的画图。实际上，也以此作为自己要求大范围地开办新的，划一的学校，构成学校系统的依据。

郑观应认为：“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同上）他将眼光扩大到了西方的“成法”——社会组织形式，而且要“变通”——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改变。这无疑是可取的。但是，郑观应在设计中忽视了初等教育，他规定书院的入学年龄在十二岁以上，已不属初等教育。初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忽视此，势必余患于后。其次，在郑观应设计中，他要求这种新的书院讲授西学以求实用，提出让学生“就其性之所近，学业四年，升至大学院，力学四、五年”（《易言·论考试》）实施的是专门教育，所以他所设想的学校系统，实际的是专门教育系统。诚然，注重工艺人才的培养，已与传统的重德经艺大相径庭，反映出近代正在发生的人才观的转变，但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学制仅有专门教育系统，那毕竟是不足的。如此，势必影响到整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他的设想是很粗略的。比如，他并没有论及学校中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也没有讲明学生凭什么资格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即两级学校如何衔接。所以总的看来，这时的郑观应在对近代学制的倡导中更主要的贡献是介绍了西方的近代学制。

二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他据民族的需要，《易言》数易其稿，1894年出版了著名的《盛世危言》，明确提出了完整的富强救国的主张。他指出要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故疾呼“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将自强恰当地放在近代商业的发展上，放在商战上。他认为商战的胜利，在双方税收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工效的提高，而工效的提高又依赖于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人才，明确地将人的培养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指出的是，郑观应从来没有将教育作为改革的唯一基点，在《易言》中，就提及了议院，而在这时则明确提出了设议院要求，是将社会政治、教育制度和发展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考虑的。

基于整个改革方案，郑观应更重视人的培养，也重视学制的建立。在《盛世危言》中，将论述学校的《学校》篇，紧随统领全书的《道器》篇，置于全书第二的位置，显示了对学制问题的充分关切。这时，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与前相比，显示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显得更有理论色彩，即为学制的倡导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盛世危言·道器》篇，是从哲学的角度统概全书的，其中一鲜明的理论特点，就是“礼失诸野”之说。故据此理论，郑观应取《礼记·学记》中关于塾、庠、序、学和分年考查的记载，认为目前西方的学制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后世荒废了，但“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盛世危言·学校上》，刊于《郑观应集》，上册）他认为西方的近代学制，是西方人力和物力的结晶，是他们窃中国古圣之余绪，精益求精后归还中国，所以中国人应接受这本来就是自己的东西，设立近代学制。这种“礼失诸野”的论证，是极其牵强附会的，其结果很可能导致人们的精神仍被笼罩在中古时代陈旧的话语编织的范畴网络之中，影响革新的进程。但事情还有另一侧面，正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新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603页）所以，也正是这种强制的附会，一方面使郑观应可以堂而皇之地介绍，推崇西方近代学制，分别以《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六国学校规制》、《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为附

录,更为详细介绍了西方的大、中、小三级学校系统,描述了西方各类学校的学习年限,入学条件,班级度、如何衔接、学校数目、经费来源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古圣贤的翼护下,回答了如何设立自己学制的问题。换言之,他的理想就是西方的近代学制。

二是更加注重“变通”,即力求参加西方学制和考虑中国国情,设计出可行的中国学制。这时郑观应仍力倡学习“西学”,而且所提的西学已包括了电学、经纬、政教、刑法、商贾等十五个科目,涉及了近代西学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个领域。他尖锐地批评了现时中的书院热衷科举,不授西学,是禁锢人才之地。但从设立新的学校需巨大的经费等考虑,他不是要求废弃这些书院,而是在国内最早提出改书院为学堂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设想了中国的学制,他说:“窃谓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官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盛世危言·考试下》)他认为在这些学校中,文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分为陆军、海军两科,各有规定的学习范围。至于具体的组织形式、学习年限、衔接方式,他的要求是:“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详订课程,三年则拔其优者,由小的而设中学,又三年拔其优者,由中学而升大学。”(同上)并规定学生必须在文、武中所学的科目里任选一科,专心学习。而在小学以下,他提出:“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同上)所以很明显,在改书院为学堂的基础上,郑观应的“变通”之一,就是将西方近代学制所包括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系统,归为文、武两类专门教育;“变通”之二是将近代西方学制中与高、中、初等教育相对应的大、中、小学,实际上改为了具有大、中小学名称的中等以上教育,而以乡设塾、公塾作为初等教育。此外,郑观应仍然是在科举制存在背景下设想学制的,此时,他除重申《易言》中改革科举制的主张外,还要求单独设科考西学,力求将科举的形式与西学内容结合从而将西学渗透到学校中。所以郑观应在设想学制中的“变通”之三就是要将经过更换内容的科举制相配合。他要求小学设在州、县,中学设在府、县,大学设在京都。规定三年甄别一次,并由各省的督、抚、水陆提督会同大学院掌教进行,这些与中国的科举考试有更多的一致。他主张:“至于登进之阶级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同上)可见,科举制的三级功名,实是科举制与他所设想的学制的连结。故从此意义说,他“变通”的学制,是一个中国的三级科举制与西方三级学校制相混合的产物。

总之,综观郑观应这时对近代学制的倡导,可看出他不仅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近代制,而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变通”,提出了较完整的中国式的学制。尽管出于改革的迫切需要,他所设计的实际上是一带有松散的初等教育为基础的专门教育的学制,以今天的学制理论衡量有诸多不足;尽管他在对学制的设想中,未能摆脱科举制的束缚,将科举制与学制相混合,但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设想的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学制,与《易言》中的设想相比,郑观应此时较为详细地论及了所设想的学制的各级学校的组织形式、学习年限、衔接方式、考核制度等,而且注意到了初等教育。这就使得他设想的学制所具备的近代学制的特征更加鲜明。他要求改书院为学堂,从中国的教育实际出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实现在中国广设新式学堂,培养改革所需要的人材的目的,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他所设想的这一科举制与西方近代学制相混合,且带有明显的近代学制的特征的学制,从而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三

我国最早拟定的学制——壬寅学制颁布于1902年,从1862年近代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成立算起,它经历了整整四十年思想上和物质上(指创立各种近代学校)的准备。那么,这一历史进程中,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具有什么影响,占有什么地位呢?

西方国家的近代学制,是在生产发展、教育普及、各级各类学校产生后,国家对各种学校的性质、任务、学习年限、上下衔接等的统一规定。它是一种行为化了的精神创造,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即西方文化的一部分。1870年,李提摩太著《七国新学备要》,林乐知著《文学兴国策》,1873年,花之安著《德国学校论略》、《泰西学校论略》,都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近代学制。但此时中国社会风气

未开,谈西学者往往被视为汉奸,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目光所及还只属于应用科学的兵、工,属于自然科学的格致等上,未意识到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所以李提摩太等人的介绍未引起足够的反应。比如,1875年的《译书事略》中的分类,就没有关于学制的书籍。而恰恰在此阶段撰成的《易言》中,郑观应介绍了西方近代学制,进行了很粗浅的关于中国学制的设想。由此可见,郑观应是国内较早认识西学制,意识到制定近代学制重要性,并在国内最早明确倡导近代学制的人。究其原因,这与他的经历和西学观有关;他早年科途不遂,投身商界成为买办,熟知外语和广泛接触中外各界上层人士,加上到香港等地的游历,使他产生了与时人有所差异的西学观。1884年他在《南游日记》中说:“余平日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这是他由来已久的认识,所以他能将注意力放到为“体”的学制上,比时人高出一筹。无需否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近代工业刚刚起步,普及教育的要求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新创设的学校为数甚少,但历史的选择性有时不是唯一的,近代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较广泛的接触,而对思想来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一经产生,便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它可以超前,对物质基础产生极大的推动。比如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正是制定了学制,设立了各级各类学校,从而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水准,对生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明治时期的滨尾新曾总结说:“在我国,并非因为有了工厂,才兴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后,才让他们筹办工厂。”(转引自:永井道雄:《近代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所以,郑观应倡导近代学制的意义,正在于是一次积极的思想启蒙,并非是完全超越时代的乌托邦。遗憾的是当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至八十年代末)中国虽具备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大致相同的生产力状况,但却为保守的乃至反动的封建制度所窒息,使得这些要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时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从而使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富国强兵的呼声日高,更提出对新的人才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是认识程度的提高等,人们注意到教育范围扩大和学制的重要。1894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首次刊行,正值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之时,以维新变法为主题的这本巨著当然受到了各方面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藩司邓华熙,都把此书推荐给光绪,光绪对此书大为欣赏,令总理衙门印了二千部散发大臣们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了五百部,仍供不应求。《盛世危言》轰动一时,因为郑观应关于学制的建议,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表现在:第一,促使人们注意、研究、提倡近代学制。如康有为在1895年在《公车上书》^①,李端芬在1896年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梁启超1896年在《学校总论》中、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都提出了学制问题。特别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将建立近代学制作为一项改革建议向光绪提出。第二,郑观应将三级科举与西方三级学校制相混合而成的学制,给不少人直接影响。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学制设想,是学制与科举并行,大、中、小三年级学校的书院改造,其程度是从十五岁起入学,未涉及初等教育。这与他于八十年代(十九世纪)成书的《大同书》中于学制的设想相去甚远,而与郑观应设想的学制有更多的一致性。有人认为《公车上书》“从郑的著作中援引了许多类似的术语,要求改革政府的选才方法,”有人认为康有为的三级学校制度来自郑观应,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应该承认处于同一时期的思想家之中,思想的交流是可能的,也应该的。此外提出与郑观应类似观点的,还有李端芬和张之洞。第三,在中国,设立三级学校系统的初步尝试,在戊戌变法中成为现实,这是在光绪的谕令下实现的,其谕令是:“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的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清帝谕各省厅州县改书院设校》,刊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而据说为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则规定将书院改为学校,“府州县谓之小学,省会谓之中学,京师谓之大学。”(《京师大学堂章程》,刊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还规定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分别为生员、举人、进士,可引见、授官,等等。将此与郑观应设计的学制对照,不难发现诸多一致:由书院改学堂;注重西学教授;立于松散的初等教育之上的三级分层学校;将三级学校等级与科举的三级功名相配合;等等。这是基于(下转第49页)

(初二级)

	算 术	代 数	几 何	概率与统计	三 角	测量或视图
国 内		1. 开方法与方根 2. 近似值 3. 坐标系 4. 二元一次方程与二元一次不等式 5. 一元二次方程式 6. 函数 7. 分式方程式	1. 比例与相似形			
香 港	百分数的运用	1. 多项式(18) 2. 公式的运用(9) 3. 比率与比例(11) 4. 二元一次方程组(10) 5. 方程与恒等式(11)	1. 三角形(19) 2. 勾股定理(8) 3. 坐标系(续)(6)	1. 频率分布及其图象(15)	1. 正弦、余弦与正切(13) 2. 简单三角恒等式(4)	1. 近似(5) 2. 圆, 长方体, 棱柱体及圆柱体(12)
台 湾		1. 因解分式 2. 分式 3. 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 4. 数的开方 5. 二次根式 6. 一元二次方程	1. 三角形 2. 四边形 3. 相似形			

(初三级)

	算 术	代 数	几 何	概率与统计	三 角	测 量
国 内		1. 续一元二次方程 2. 指数与对数 3. 函数及其图象	1. 圆	统计初步	解直角三角形	直观的空间图形性质
香 港	百分数(续)	1. 指数(6) 2. 常用对数(12) 3. 不等式(12) 4. 一元二次方程(19) 5. (1)不等关系 (2)等差数列 (3)等比数列	1. 全等, 相似及平行(续)(23) 2. 直线(坐标系)(16)	1. 概率(8) 2. 集中趋势(11) 3. 统计的用途与误用(17)	1. 三角的运用(15) 1. 数值三角	1. 测量(16)
台 湾	选修	1. 根式 2. 一元二次方程 3. 不等式 4. 对数			1. 锐角三角函数	

(本文责任编辑: 吴辑宏)

(上接第59页)

同一历史条件下思想交流的结果。故笔者认为: 郑观应关于学制的设想, 推动了维新中对学制的倡导, 经过维新变法, 在一定程度上转为现实。

维新运动期间, 据不完全统计新设立的学校有106所之多。(见林克光:《康有为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 刊于《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维新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此后清末的兴学中, 各级各类学校纷纷设立, 终有了《壬寅学制》的公布,《癸卯学制》的颁行, 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对此, 我们不得不说, 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 促进了戊戌维新学校的设立, 戊戌维新的思想解放, 客观上的需求又促进了学校的勃兴和学制的创立。我们肯定那些学制的制订者, 称赞那些学校的设立者, 也就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思想启蒙者, 应给郑观应在中国近代学制史上以推动了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的应有地位。(本文作者是华东师大教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 何国华)